

现代性的凸显:论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

张乐林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处在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是1920年代武侠小说的扛鼎之作,无论从其思想内容折射出的现代微光、对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还是从其艺术观念的现代革新等方面看,都充分显示了它在中国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民国武侠小说;武侠元素;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7.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041-06

晚清以降,现代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显山露水,催生了“新”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融关节点上出现的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必然会融入这一现代性潮流之中,其上承下启之功,使之成为现代武侠小说1920年代的巅峰之作。本文从其思想内容、传统元素、艺术观念三个方面出发,旨在阐明《近代侠义英雄传》在武侠小说现代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从“消解”到“重构”——思想内容折射的现代微光

(一)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演进

武侠小说从起源到成熟,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元素始终控制着它的思想命脉,即儒家节操、墨家行为、道佛人格个性。明代以来,儒家文化的“忠义”观念及其矛盾冲突贯穿传统武侠小说始终,从《水浒传》的“忠君孝悌”到《三侠五义》的“为王前驱”,始终将“侠义英雄”与“君主帝王”捆绑销售。而到了平江不肖生这里,英雄与君主、侠义与清官的关系才有了新的阐释,才基本挣断了“侠义与公案的孪生子”的传统锁链,挑起了现代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大梁。

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传统的君臣关系已不复存在,英雄的传奇故事不再是清官带领下的“王朝马汉”各显神通的集体狂欢。书中对英雄壮举的筛选从目的到意义都已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窠臼。如果说侠义公案小说的英雄传奇多是为忠君孝悌观念服务,从而使小说具有明显的道德说教意味;那么,《近代侠义英雄传》则是在动荡的历史背景和江湖背景衬托下,显示了侠士英雄们振兴武术、扬我国威的英雄气概。这种文化品格已截然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们:后者的人生价值始终和狭隘的忠孝仁义相结合,和特定的封建统治者联手,最终只能是“一姓之家奴”;与之相比,《近代侠义英雄传》以霍元甲为代表的“侠义英雄”们的人生内涵,具体指向了国家和人民,使儒家的济世精神有了新的内容,超越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樊篱。

从更深的层面来讲,这也反映了侠的自我精神内核的转向,传统武侠小说中侠的终极追求是求取功名、封妻荫子,是一种狭隘的“小我”世界观;而《近代侠义英雄传》中这种狭隘的自我观被同化进入民族家国的“大我”中。正如小说中的擂台已不是个人比武、求取功名的阵地,而是国民团结、共抗外敌的象

* 收稿日期:2010-11-10

作者简介:张乐林(1965-),男,河南巩义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后金庸’武侠小说与武侠文化现象研究”(07JA751029),项目负责人:韩云波;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发展道路研究”(2009YY05),项目负责人:韩云波。

征,霍元甲的武术成就不仅是个人的成就,乃是整个中华武术的结晶,所谓人人强则国强,最终精武体育会的建立与武术热的兴起、国民强身健体努力摆脱“东亚病夫”的事实,无一不昭示了个人主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在双向互动中求得的统一。从这一理想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

武侠小说中自古不乏和尚道士,佛教的轮回、报应、因果、赎罪、皈依等思想,道家的鬼符画咒、剑气合一、神仙法术、宝物毒药等,历来都是武侠小说的基本元素。《近代侠义英雄传》虽对佛道着墨不多,但几个出场的道人,言语之间参禅论道,字字珠玑。如第56回陈乐天对“快乐之道”的阐释,显示着智慧的锋芒,已经超脱了世俗对快乐的认识,达到了形而上的哲思境界,体现了对生命意识的现代思考。

(二)对江湖乌托邦性质的超越与反抗

谈论武侠小说,必然离不开江湖,江湖不仅是武侠人物的活动场景,也是武侠心态的文化表现。在武侠小说中,“江湖”是一个虚构的正反乌托邦合体,既代表与昏暗现实、朝廷庙堂、法律伦理、经济实体相对立的快意恩仇的自由乌托邦,又折射了充满杀意诡计的险恶现实空间以及官场阴暗、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负面历史场景。在这样的二重奏的“江湖”上行走的侠客豪杰,具有在虚幻江湖中狂欢和在现实江湖中救赎的双重身份。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以“三侠五义”和“开封府”、“水泊梁山”为代表的传统武侠里的江湖就明显地呈现出正反乌托邦二元对立的理想色彩。而在《近代侠义英雄传》这里,新的异质因素如国家、民族、中西观念、中日关系等的加入,超越了传统武侠对江湖二元对立的简化,使得江湖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拓宽了对江湖的书写,赋予江湖更深刻的现代内涵。从另一层面看,在传统武侠那里,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代表的快意恩仇的狂欢基调,增强了《水浒传》的救赎意味;而在《近代侠义英雄传》里,王五和霍元甲都是可以在狂欢乌托邦的江湖中叱咤风云、逞情使性的英雄好汉,然而却在异质因素构成的反乌托邦江湖中命丧黄泉,从而失去了救赎的资本和意义。狂欢与救赎的同构关系发生了错位,彰显了小说的悲剧意识,也使得小说由此获得现代性的色彩。

(三)对国人“嗜血性”表述的转变与减弱

“杀戮”是武侠小说最常见的基本元素之一,无论是瞒天过海的江洋大盗的烧杀淫乐,还是穷凶极恶的变态狂魔的肆意屠杀,或侠义英雄、正义之士的快意恩仇,无不使武侠小说与血腥、暴力紧紧结合,这也是众多评论家历来诟病武侠小说的关键所在。虽说如此,“杀戮”现象带来的阅读快感,或可说是国民对嗜血性从根本上的认同,依然在武侠小说中传承流转。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国民充当麻木看客的劣根性顽疾,在“杀人”和“被杀”的游戏中拍手称快;另一方面也因为“杀戮”是最能体现正义和邪恶较量的基本条件,失去了它,武侠小说就在某一程度上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当然,随着现代文明进程,这一“杀戮”已经由血淋淋的以暴制暴以及将敌对者置于死地为最终目的,演变为抽象的点到为止并以武德境界的高低论成败、论英雄的哲学层面。具体到《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书中各路英雄豪杰的交锋与较量,更多地体现为在拳脚武艺上一较高下而败者甘拜下风甚至拜师学艺的和谐氛围,很少有直接的杀人场面描写。各路英雄对武术的理解,已不仅仅是为了逞勇泄愤或者报仇雪恨,更多地是对武术本身的挚爱和为国争光的精神。因此,他们面对挑战者,更多地是以宽容的姿态和以武会友的心理来接受,体现了对武术本身的尊敬和对武德的崇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侠义英雄传》巧妙地转变了国人“嗜血性”的取向,不仅满足了看客的心理,并且使得看客也获得了对武术、武学更深刻的理解。

(四)科学意识和进步价值观的现代构建

《近代侠义英雄传》是第一部反映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武侠小说。在国贫民弱的近代,能够将武术放在中外文明对接中描述,并且避免了盲目自夸和刻意仇视,将“爱国”和“学外”交融一体的作家,可谓少之又少。平江不肖生“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武化’侵略持坚决抗击的态度,但对于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充分肯定:‘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学’而不‘媚外’”^[1]。当然,“武侠中的科学,主要是作为一种因素的渗入”,“对于科学主义之智慧的追求,使人物可以超越狭隘的视野和见识,在更广大、更崇高之处来思想和行动”^[2],书中通过霍元甲等一批侠义之士对中外文明的态度来进行体现。如黄石屏对中医针灸和穴位的科学分析以及与德国医

学家的交流,秦鹤岐对外旺内伤之症主张内外兼修的科学态度,霍元甲、农劲荪与外国大力士的较技、交锋,彭庶白对日本柔道的科学方法的肯定,德国和日本学者的敬业精神,西医的科学之处,以及日本武术对中国撰跋武术的超越和发展等,不仅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超越实证科学之处,同时真实而残酷地反映了它在西方列强入侵下的危机,以及提倡科学教育的紧迫性。

更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平江不肖生对传统拳术的批判是有意识的,书中借胡大鹏之口明确提出拳术口手相传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批判了狭隘的功利主义拳术观。“科学主义使武侠的敬业精神找到正确的道路,成为小说以及人物智慧升华的武器”^[2],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在现代兵器发达的时代,必须重审习武的目的,不是称霸一方,争论高下,而是作为一种科学的教育方法将之纳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从根本上提升作为人的进化的功用。此外,法律意识的凸显,也是其思想现代性的一个方面,通过霍元甲与英国奥比音比武合同的签订过程,有力地彰显了法律在中外文明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中国人法律意识有待提高的必要性。同时,平江不肖生还对义和团落后狭隘的民族仇视心理进行了批判,锋芒指向虚假的爱国主义,并对其刀枪不入的神功进行了戏谑和嘲弄,增加了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二、从“旧侠”到“新侠”——传统武侠元素的现代释义

(一)“善”与“恶”的现代判立

传统武侠大多可纳入“扬善除恶”主题模式之中,善恶对立冲突的先验设定与展演,是传统侠客崇拜的中心内容。但同样是“扬善除恶”,彼此的精神指向却大有区别。清代侠义小说把立足点移向了朝廷,侠客如黄天霸、展昭之类的侠举,总是与官府所赐相连。民国作家受民主观念影响,将价值取向从朝廷下移至江湖,“这样做不只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来‘总领一切豪俊’,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以及武侠小说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3]。《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不无这样的侠客,回归普通人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心理,尤其是小说前半部,众多侠义人物的壮举都不能用传统的善恶观进行评判,也不仅仅局限于为民请命即为英雄、打家劫舍即为恶人的二元对立标准。书中多数出场的英雄其实并不见得有为国为民的豪言壮举,而多为身怀绝技的武艺所倾倒,拥有一招一式的绝世武功就可成为大侠,善恶对立的界限在此已经模糊化,颇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开放求学心态,这无疑拓宽了“侠”的传统概念和“英雄”的狭隘定义。不再用除恶的壮举标榜善,也不再仅仅从善意的壮举中推选英雄,英雄也会意气杀人,豪杰亦有作恶之处,窃贼还可改邪归正,大盗仍可拔刀相助,正如罗大鹤仇杀金光祖、陈志远作弄吴振楚、赵玉堂收山谋正业、胡九惩恶显仁义等情节,甚至如赵玉堂、陈广泰、胡九等虽都以盗窃为生,但依然不失侠义风范,都显示了善恶道德的相对性和人性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小说也对传统以相貌特征标榜英雄的类型化手法有所突破,超越了正人君子必是相貌堂堂、铁骨铮铮,坏人恶棍总是青面獠牙、贼眉鼠目的简单划分,批判了善恶直接显示在相貌特征上的脸谱化、概念化描写。如陈乐天,在书中是黑麻脸、瓜皮帽、腌臢样,典型的乞丐行头,但“不但不厌他腌臢,反觉得他这般本领的人,越是腌臢,越显得他不是寻常之辈”,这很可能为后来新武侠小说中丐帮的描写提供了原型。这种对侠义英雄种类的拓展,不但丰富了英雄的类型,而且使得英雄形象从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坛落下,成为身边随处可见的邻家大叔或无名小卒。从更深层次来理解,这反映了平江不肖生的平民观念,亦即侠义英雄可能随处可见、能人奇技也许无处不在的现代意识。

(二)“武”与“侠”的复杂演绎

“侠”作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现象,几千年来,从唐传奇的“豪侠”到后现代“玄幻小说”的“玄侠”,侠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内涵不断深化变迁,影响所及,形成了社会上崇侠尚武的文化性格,甚至成为华人心理积淀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在1920年代之前,“激进‘武侠’理想的强烈政治功利化倾向,使侠文学的‘心理需求’与‘乌托邦冲动’功能被大大削弱,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和情趣。尽管‘武侠’观念名动当世,创作却乏善可陈。武侠小说作为一个自足的文类系统,直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出现,才可以算作真正的开始”^[4],所以,《近代侠义英雄传》在侠观念的更迭转换之间起着重要的过渡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因观念不同导致的叙事策略的不同,传统武侠小说多强调抵抗侵略、复仇,塑造舍生取义、替天行道

的道德观念英雄，而《近代侠义英雄传》叙事的重点却在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民族兴亡与谈武论道之间回旋。反映在小说中就既有以张乐天、胡大鹏等为代表的为武而生、自由漂泊只为寻找真正的武术高人的侠客，也有以王五、霍元甲等为了民族大义而超越个人生死的侠客，在这里已不是狭隘的“忠君报国”观念的再现，而是在现代精神观照下的国家和民族意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小说还阐释了武学中浸润着的文化精神，“作者并不满足于‘武艺’表层的描述，而是从‘道’与‘艺’、‘武与德’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并且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表现和阐释”^[1]。这里的“武”，已不是匹夫之勇的简单重复，而是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现代表达。这里的“侠”，也不是惩奸除恶的简单复制粘贴，而是不计前嫌化解恩怨，融小我于大我，融私利复仇于民族大义的集体意识和家国观念的体现。昔日狭隘的正邪之争、武断的扬善惩恶、盲目的意气争斗，不再制约着侠客对武道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超越。这里已经萌发了对“道”本体的追索，开始了对真正“武”的精神的重新审视。这些都体现了平江不肖生对侠客的精神世界和个体价值的发现与尊重。

平江不肖生也成功地把哲理糅进武功技艺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欣赏到人类智慧的力量，也因深化了武功描写的审美内涵而真正打破了旧体朴刀赶棒小说及侠义公案小说的武功描写程式。写武功，不再一味求细求实、侧重一招一式，而是更注重对阵双方招式的虚幻描写，或者刻意运用虚幻动作来替代实际打斗动作的描写，给了读者巨大的审美体验空间。从“形”到“意”，从程式化的描写转向想象性的增加，体现了武侠小说过渡期所具有的现代性演变特征。同时，武功的描写已不仅仅局限于对外在武术技击的日益精湛追求，而是转向了对内功的重视，这种内外兼修的内盛则外旺的新认识，在洋溢着科学规律的同时，显示了人们对自我身体的更深层次理解。如彭庶白论及习武者内外力量须均衡实用时说：“多少吨的军舰，只能安设多少口径的炮，若是船小炮大，一炮开出去，没打着敌人的船，自己的船已被震坏了。”正是告诫习武者要量力而行，外家功夫须与内力的承受相结合，才能迸发无穷的力量。这是其后新派武侠武功描写走向哲学化的前提和准备，寓理于武，以武喻人，这是走出传统规范后武功描写的总体特征与崭新品格，它使得武学技艺重新获得了诱人的风姿奇彩，构成了新的形态。

（三）对“礼”的现代呈示与“众生平等”的人性关怀

《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对“礼”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婚恋观和女性观方面。书中较少涉及爱情描写，而在仅有的两段婚姻描写上，作者寄予了平等开放的自由婚恋观，在余伯华与卜姐丽的婚姻关系中，一个秉承“婚姻大事，须得由自己做主，有家长代办的最不妥当”的新式婚姻观，一个“登了一条中国从来没有的征婚广告”，开了现代社会个人谋取婚姻幸福的新途径，两人中西结合，其进步与开放的程度堪与当代社会相提并论。在张同壁与屈螭斋的结合中，两人并不是因为家境相合或倾慕对方的美貌金钱等外在的婚姻因素，而是出于性格的接近而恋爱，这由共同的爱好习性、品德行为为基础组建的爱情，无疑更接近于今天我们提倡的平等自由婚恋观。《近代侠义英雄传》刻意描写的女英雄很少，主要是凤阳女子、黄辟非和胡丽珠三人，她们习武，不为男性而为国家、为爱好、为自由、为争取男女平等、为自身生命的追求。虽然对女侠客着墨不多，但已有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蛛丝马迹，女性已经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敢于向男权父权挑战，尽管这还只是萌芽，但为后来新派武侠中男女平等观念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近代侠义英雄传》对“人”的生命的珍视，也是其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进步之处，与传统武侠崇尚“杀戮”相反，书中处处洋溢着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英雄死亡的悼念之情。如谭嗣同死后王五痛哭三天三夜的感人场面，摩霸输了赌约自杀身亡后李震东痛悔万分的哀伤情景，罗大鹤与金光祖死后王五惋惜并厚葬二人的义举等，这里不是恩将仇报、快意江湖的肆意演绎，不是对暴力和血腥的拼凑，而是体现着深刻的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作者强烈的人文情怀。小说中有很多比武场景，胜出的英雄侠客都能以悲悯宽容之心对待败北者，武功较量更是点到为止，黄石屏不愿为德国院长做点穴实验，胡九为作恶者求情等，都体现了作者的悲悯情怀。作者更是借助黄石屏教育女儿黄辟非的话说：“他们虽是当挑夫的人，性命是一样的紧要。”道出了人人平等的现代观念，显示了作者尊重人性、期盼平等的人道主义情怀，应该说这是与“五四”发现人、尊重人的新文化路向一脉相承的。

总体来说，构成武侠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各种母题与元素，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都被打上了现代性

的烙印,其在过渡时期体现出来的新观念,使得小说的内涵变得丰富和生动起来,获得了更大的可阐释空间,为后来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三、从“压抑”到“自由”——艺术观念的现代革新

(一)娱乐性的多维度拓展

娱乐性是武侠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从传统武侠小说道德说教中挣脱出来的娱乐性,才使得现代武侠小说获得了新的定位,为后来新派武侠小说空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近代侠义英雄传》开始尝试将戏谑游戏的元素注入小说,为被道德重担压得气喘吁吁的传统武侠小说找到了如释重负的理由,促使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娱乐元素由禁忌走向自由,由压抑走向开放。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娱乐性,首先表现在大量外国元素的涌现,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和审美性,几个大力士的出场,卜姐丽的西式婚恋观,德国院长讲述的医学轶事,秋野对日本文化的介绍等,不仅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提供了解国外生活的窗口,更体现了作者对中外文明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当然,小说的娱乐性不仅是异质元素的增加,更是由于小说本身的语言描写和游戏场景的加入,全书叙事语言轻松明快,取得了良好的幽默效果,使得读者在各位英雄侠客的传奇故事间游走,感觉不到丝毫沉闷和肃杀,更多的是愉悦和轻松。陈乐天对寄住旅店的饭食的作弄,显法术纸人扛剪刀的离奇细节,龙在田夜偷张文达衣被的搞笑,都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心一笑。此外,娱乐因素的增加也体现在对武林风俗的描写上。“《近代侠义英雄传》就谈到当时江湖上公认的行规‘过堂’和‘驮黄包袱’:前者是一种先准备好了后事的不死不休的决斗,其间又有种种讲究;后者从江湖俗谚‘黄包袱上了背,打死了不流泪’说起,是武林中显示自己有本事的一种方式。”^[5]这里的民俗描写,虽然只是星星点点的碎片,但足以在武侠小说娱乐性的发展历程中留下印记。

(二)从“扁平人物”到“圆形人物”的逐渐推演

福斯特曾将小说人物分为“扁平”与“圆形”两类,《近代侠义英雄传》处在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手法和人物塑造有待提高的时代,其小说人物由扁平向圆形的过渡,由平面化向丰满和立体的转变,有着进步的意义。小说中出现的60多个人物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霍元甲,但这个主角并不是一出场就具备了担当民族大义的英雄素质,出场就定型的脸谱化手法被性格逐渐发展的多元化手法所代替。少年时的霍元甲是作为被欺负的对象出场的,身材弱小不宜习武,自学过程中也有年少气盛的缺点,尤其是在后半部书与奥比音签约比赛的描写中,作者不仅写出了霍元甲的爱国大义,也凸显了他急躁、细节考虑欠妥等性格缺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一再提到霍元甲对待钱财的态度等细节,传统武侠小说对侠客的描写多是仗义疏财的,爱财则构成反英雄的显著标志,所以很少有武侠小说把经济问题放到侠客英雄的面前,对金钱的逃避应该说是传统武侠的一个软肋,这里虽有类型小说特点要求的某种合理性,但也使得武侠小说显得脱离现实而被人诟病。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作者数次提到霍元甲因为设擂台比武没有获得应有的收入而产生的担忧,这固然与霍元甲当时的实际处境和其商人身份有关,但也正是其重财性格这一侧面,恰恰消解了霍元甲高不可攀的民族英雄形象,使他的形象从扁平变得复杂、真实,显得可亲可敬。当然,霍元甲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农劲荪角色的设置密不可分,他是侠义公案小说中清官身边军师的变形,正是这个参照角色的出现,突出了霍元甲主角性格的丰富性。农劲荪的沉着冷静、善于演说、精明能干、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和包容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衬了霍元甲的急躁狭隘、意气用事、维护面子、轻信他人等性格缺陷,从而使得霍元甲这一人物具备了复杂的内涵,拓宽了传统武侠对人性描写的范围,深化了对人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认识。

(三)说书痕迹的减弱与白话语言的蜕变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小说,必然会有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模式。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模式化既是它的致命弱点,也是它经久不衰获得持久生命力的不二法门。虽然“原侠+善”、“原侠+恶”的结构模式无法最终打破,但在叙事模式和形式创新上的尝试,却从来没有被武侠小说家们放弃过。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出现,正处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改革最重要的时期,社会生活众多方面的变

革,都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文体的表现力。如果“把小说形式研究与文化背景研究结合起来,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6];当然,反过来说,社会变迁也必然制约和影响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武侠小说独特的生产和运作机制,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特性等,都决定了它必然要受到比新文学更为严格的制约,其蜕变和发展更为艰难和不易。具体到《近代侠义英雄传》,则因为大众传媒的出现,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化道路,因此,为了刊物连载需要和适应读者的阅读心理,小说只能采取适当的有限度的革新:虽然保留了章回结构框架,但消解了说书痕迹,淡化了说书人的存在;虽然仍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但第一人称叙事也已萌芽;虽仍使用顺叙的连贯叙事,但倒叙、设置悬念、时空跳跃、交叉叙述等也造成了某些陌生化的效果;结构虽然仍脱不出串珠式结构,但已有了贯穿全书的主人公。这种文体的革新虽然很有限,但也的确反映了作者勇于探索的努力。

如果说读者在《水浒传》、《三侠五义》的阅读中仍感到半文半白的不通畅,那么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则尽可享受纯粹现代白话文的阅读快感。语言生动灵活且能因人而异从而富于个性化,霍元甲的浅显、农劲荪的缜密、张文达的粗鲁、德国医院院长的高深、张乐天的精辟等,都各具特色。应该说作者既借鉴了西方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优长,又发扬了传统语言的雅致,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风格。

(四)现代传媒批量快速的娱乐复制

武侠小说的勃兴和通俗文学的发展,与现代传媒之间构成了比其他文学样式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武侠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是现代传媒进行商业运作的卖点,而快速的娱乐复制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又构成了作家的写作动机。这是一个双向互利、合作共赢的运作行为,再加上读者对快餐文化的心理需求和时局动荡、都市勃兴带来的对通俗文学娱乐性的需要,都形成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武侠小说的生成循环链。可以说,现代传媒在武侠小说传播中的出现,是武侠小说现代性演变的重要标志。

《三侠五义》等传统武侠小说虽然也利用媒体资源,但大多还是依赖说书形式在街头巷尾口头传播,到了《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时期,由于报刊化和商品化的影响,小说有了更大的传播舞台,由此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坛第一波“武侠热”。小说商业化的成功,还带来了作品的横向移植,如此后以小说中主要人物为题材的影片陆续搬上银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上蜂拥而起的“武侠风”,这也正是传统武侠小说在受众影响上难以望其项背之处。当然,文化市场化商业运作的成功所带来的革命,绝非简单的传播方式的变革,它波及的范围,它对上至作家创作手法、写作模式、叙事特点,下至读者阅读心理、接受美学机制等方面的影响,在以后的新派武侠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这一革命性的演变中,《近代侠义英雄传》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应该对其给予足够重视的。

处在现代思潮冲击下并与世俗大众审美情趣息息相关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其呈现的现代性虽无法与“五四”新文学比肩,但无论是在张扬时代精神还是打破传统枷锁方面,都显示了其高于同时期同类小说的“现代”精神,从而在武侠小说的现代性演变中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 [1] 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471.
- [2] 韩云波.“三大主义”:论大陆新武侠的文化先进性[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3-69.
- [3] 吴秀明,陈择纲.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G]//王敬三.阅读金庸世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6-49.
- [4] 韩云波.“反武侠”与百年武侠小说的文学史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8-24.
- [5] 韩云波.民俗范式与20世纪中国武侠小说[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86-91.
-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45.